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

宋炳輝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

宋 炳 輝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中國現代文學論集

宋炳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
民 96

頁：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5)
含參考書目

ISBN 978-957-549-713-2 (平裝)

820.9708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5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

著 者：宋 炳 輝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2007)四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713-2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

目 錄

縱論篇

“百花時代”的社會矛盾與知識份子的精神探索·····	1
時代文化的壓力與文體規範的變異	
—— “潛在寫作”文體特徵的一種探討·····	23
長篇小說在中國的土壤難議·····	35
大眾文藝：傳統的與現代的·····	39
區域性文學研究的開拓性工程·····	43
現代翻譯文學：一個未被重視的漢語寫作資源·····	51
民間的意義及其限度·····	57
網路文化是一把雙刃劍·····	71
媒質變化的衝擊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	83

現當代作家篇

志摩的人與《志摩的詩》·····	101
徐志摩早年日記的發現及其價值·····	117
懷舊的姿態與悖論 —— 由電視劇《人間四月天》談起·····	131
矛盾的矛盾：交錯在政治與文學之間的人生選擇·····	137

2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作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	159
破碎的月亮與渺遠的日出 —— 老舍與曹禺筆下的兩位女性形象	165
後期穆旦的兩種表達方式：翻譯與創作	181
寬容背後的激情 —— 王蒙早期創作的自我超越	199
兩代人的追求 —— 王蒙、張承志小說的比較	211
張承志和他的散文《走進大西北之前》	223
面對苦難的現身說法 —— 論張煒的三部長篇小說	229
 憂傷的雞尾酒（代跋）	244

縱論篇

2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百花時代”的社會矛盾與 知識份子的精神探索

一、“百花時代”¹的文化背景和知識份子的處境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最早醞釀於 1956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時²，同年 5 月 2 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將這一方針公開提出，宣佈“在藝術方面百花齊放的方針，在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³。5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由北京知名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參加的會議上，中宣部長陸定一在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⁴對這一方針作了權威性的闡述，指出這一方針“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

1 這裏沿用洪子誠先生術語，是指從 1956 年初“雙百方針”提出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一段時期。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2 參見夏杏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形成過程的歷史回顧》，載《文藝報》1996 年 5 月 3 日。

3 同上。

4 報告載《人民日報》1956 年 6 月 13 日。

4 追憶與冥想的誘惑

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同時說明它的實施界限和範圍“是人民內部的自由”，“這是一條政治界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陸定一的報告標誌了“雙百方針”正式實施的開始。

這一重大方針的提出，有著國內國際的具體歷史背景。從國內來看，對階級鬥爭狀況的估計，對中國面臨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任務的理解，以及對知識份子政治態度和思想狀況考察的變化，是“雙百方針”提出的重要依據和條件。1955年的“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所造成緊張的社會氣氛，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和對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而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這使最高決策者對政治形勢的估計也有了變化，毛澤東主席做出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的論斷，要求把全黨和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⁵。這樣，發掘和動員建設資源，“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⁶就成為當務之急，而其中知識份子的積極性自然是至關重要的。當時，知識份子身上因“胡風事件”留下的心理陰影還沒有消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56年1月召開了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所作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善知識份子工作條件（包括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環境的條件）的重要許諾，承認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經過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思想改造，“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對象。

5 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頁。

6 見《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頁。

就國際形勢看，50年代中期蘇聯和東歐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雙百方針”政策得以產生的重要背景。特別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隨之而來的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群眾性事件，進一步從正反兩個方面推動了中國決策者們強化了原有的衝破蘇聯模式的立場，加快了尋找中國式道路的探索，從而逐步形成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以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來繁榮科學和文化事業，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避免這種矛盾因處理不當而發展到對抗性地步的思路。具體到文學藝術領域，蘇聯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文藝思潮的變動對中國產生了直接影響。史達林時代結束後，“解凍文學”思潮隨之興起，一批在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和恢復名譽，尤其是1954年召開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的質疑，顯示了蘇聯文壇的一種企圖“復活”近、現代文學另一種曾被掩埋、被忘卻的傳統的努力，這也激發了中國作家對五四新文學的啓蒙主義傳統的重新認識，它與國內政治形勢的社會變化一起，共同構成了“雙百方針”提出期間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雙百方針”的提出，體現了在人民共和國新體制下，在特殊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國家最高決策者對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一種新的嘗試，它顯然包含了對科技學術和文藝創作自由的宣導的努力。但是，它的表達方式卻又是“含混的詩意化”⁷的。它之所以不採取法律條文的形式來保證文藝和學術的自由，而要採用文

7 見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收“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學性的語彙來表達、採用政治宣傳的方式來展開，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曖昧、猶疑心態。具體表現在：一，“雙百方針”從提出的一開始就包含了多種解釋和自我防禦的成份。例如，毛澤東在提出這一方針之初，就規定了它的實施範圍：“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⁸，陸定一的報告對此從正面作了規定：即“雙百方針”是“人民內部的自由”，指出“這是一條政治界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⁹。這就意味著，如果某些人一旦被判定為“人民的敵人”，他不但失去了行使“雙百方針”的權利，而且他們的言行也就會被認定為來自敵對陣營的“倡狂進攻”，但確定敵我陣營界線的標準並沒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條文規定。二，事實上，從“雙百方針”宣導的一開始，對於學術問題的具體爭論都是在最高決策者的干預和控制下進行的，形勢的發展很快表明，並非所有的學術問題都是可以拿出來爭鳴的，除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外，學術領域中如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方面問題的討論也顯得相當敏感。三，“雙百方針”的落實過程一直處於搖擺不定之中。對知識份子而言，對胡風事件仍記憶猶新使他們在這一方針提出之初，於興奮的同時仍有觀望心理，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¹⁰這一形勢估計，反映大部分知識份子的典型心態。同時，代表國家意志的輿論也一直左右搖擺，特別是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一段時間裏，情勢有點讓人捉摸不定，1957年1月，陳其通等人的《我們對目前文藝

8 同注1。

9 同注3。

10 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有這樣的文字：“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醜。”

工作的幾點意見》已經被人視作“收”的信號，但毛澤東否定了這種左的傾向，並進一步開展整風，結果使文藝界的挑戰聲擴展到整個知識界。但不管怎樣，這一方針的提出仍然極大地鼓舞了知識份子，使他們逐漸從胡風事件的陰霾和驚恐中擺脫出來。

儘管如此，在 1956 年初到 1957 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時間內，“雙百方針”還是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在它的提出和貫徹的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的統制一時間似乎有所鬆動，與知識份子傳統間的緊張關係也有所緩和，知識份子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批判的熱情也空前高漲起來。就文藝界來說，“雙百方針”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老作家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以來，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和戰爭文化規範下的解放區文學傳統間形成的無形隔閡。包括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在內的許多跨時代的作家都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門也推出（或計畫出版）了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和廢名等作家的作品選，包括張友鸞、張恨水等現代通俗作家在內的許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的翻譯研究者一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對中國當代文學傳統資源的相對狹隘提出了質疑和批評¹¹。

第二，在文學理論中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復人道主義傳統。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及其內涵，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湧等人都做出了各自的思考，其中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道路》¹²一文的影響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認為在堅持

11 見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 29-45 頁。

12 署名何直，刊發於《人民文學》1956 年第 9 期。

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總原則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這既有蘇聯文學界對這一創作方法修正的國際背景，也反映了中國文學界對 50 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所體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的質疑和反思。這些思考在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現實干預性、主體性的強調，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胡風文藝理論的延續和展開。另一方面，錢谷融、巴人、王淑明等對文學中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又與有關典型、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一起，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

第三，出現了一批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創作，這標誌著社會主義文學開始成熟。這部分文學創作主要是由一批年輕的新生代來承擔的。青年作家王蒙、劉賓雁、宗璞、李國文、陸文夫、從維熙等人的小說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劉等人的詩歌是文學創作中最能顯示“雙百方針”巨大精神力量的成果，這是“五四”知識份子為民請命的啓蒙主義傳統在新時代的再生。他們或者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大膽干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內部的複雜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和其他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極現象，及其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著的弊端，體現了同樣的現實戰鬥精神，或者涉及了以往的社會主義文學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了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從而折射出時代歷史的變遷。

如果深入分析的話，文藝界的這一新氣象的出現，一方面是來自對五四精神的復活，提倡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和對現實生活的積極干預，提倡寫人性，都是來自“為人生的文學”、“人道主義文學”的五四新文學主題；另一方面，揭示社會主義矛盾的文學創作，和反對教條主義的理論鬥爭，雖然是由文學新生代提出，

但依然是延安時代王實味、丁玲等一部分知識份子先知者反省和批判革命陣營內部不良傾向的思想延續。所以，既然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就不能不帶來作家們對50年來占主導地位的戰爭文化規範下的審美原則和教條主義的批評。

首先是對教條主義的直接聲討。姚雪垠在《打開窗戶說亮話》¹³一文中尖銳指出，文學創作中的公式化主要“應該歸罪於教條主義的猖獗”，而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只有清除教條主義的危害，才能使作家擺脫“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其次是對50年代初期文藝現狀和成果的反思與再評價。如鐘惦斐¹⁴對國產電影創作的批評，劉賓雁¹⁵對文藝創作、戲劇演出和書刊出版業的尖銳批評，並把創作的落後、公式化概念化的嚴重與文藝規範和文藝領導方式聯繫起來。而最為尖銳的話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新體制下的指導作用，劉紹棠認為，文學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就在於教條主義者機械地、守舊地、片面地、誇大地執行和闡發了毛主席指導當時（指抗日戰爭時期——引者注）的文藝運動的策略性理論”¹⁶，其行為表現在要求文藝作品及時地為政策方針服務，以及片面強調普及為主等等。從這些發難中可以看出，挑戰性的作家來自各種不同的傳統，不僅有來自五四新文學傳統下的作家群，也有解放區來的作家，甚至還有新中國成長起來的新生代，這實際上是繼胡風之後，文藝界又一次對文藝創作和批評領

13 原載《文藝報》1957年第7期（5月19日出版）

14 鐘惦斐《電影的鑼鼓》初刊《文藝報》1956年第23期，同年12月21日《文匯報》轉載。

15 見劉賓雁、陳伯鴻《上海在沉思中》，載《中國青年報》1957年5月13日。

16 見劉紹棠《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載《北京文藝》1957年第4期；《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載《文藝學習》1957年第5期。

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現象的批判，這種批判某種意義上也是已被在政治上整肅了的胡風文藝觀點重申。

然而好景不長。到 1957 年夏季政治形勢發生了突然的逆轉，“百家爭鳴”一下子變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家”的政治鬥爭，“雙百方針”竟然被曲解為“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政治鬥爭手段，一場反右風暴很快地結束了這一繁榮局面，全國有 55 萬人被定為“右派”，其中極大部分都是知識份子，文藝界的一大批作家、批評家如丁玲、馮雪峰、艾青、秦兆陽、姚雪垠、吳祖光、穆旦、王蒙、劉賓雁、李國文、陸文夫、鐘惦斐等都在其列。上述在這一時期剛剛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幾乎無一例外地被風暴所席捲，他們的作品被視為“毒草”而遭到批判，作家本人則被打入生活的底層，不僅失去了創作自由，而且喪失了起碼的政治權利，直到二十多年之後，他們才作為“重放的鮮花”而再次開放在中國文壇。

政治形勢的逆轉使剛剛有所糾正的極左路線得到進一步發展，隨後的 1958 年，在經濟建設領域出現了不顧實際的“大躍進”、“共產風”，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便是“新民歌運動”，數以萬計的粗製濫造的“大躍進民歌”，絕大部分都是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政治觀念的圖解，成為當時“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產物。到這時為止，來自共產黨外的知識份子的批評力量幾乎喪失殆盡。60 年代的文藝界思想鬥爭，則主要體現為主流文化內部的部分決策者（周恩來、陳毅、茅盾、邵荃麟等）對極左路線的反撥努力，但這種努力終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成效。

不過，壓抑性的時代文化的並不能使知識份子停止思考，他們面對初露端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在

各自層面上表達了自己的思考，而且，那些即使是微弱的聲音，也就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二、新的矛盾和困惑

在社會主義文化的這一體制化和調整過程中，作家們居於不同立場的選擇，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體現了對現實矛盾的不同態度及其表現方式。其中除了郭沫若、何其芳、賀敬之、劉白羽、楊朔等人的頌歌型詩文，表現了他們與時代主流話語的認同外，還有幾種不同的表現形態。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就是在特定的時代歷史條件下，直接以文學為武器或通過文學形象，積極參與現實政治、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矛盾、干預現實生活的創作。劉賓雁的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作品是這一類創作的代表。

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¹⁷。當時王蒙年僅22歲，卻已是八年黨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他身為北京共青團市委幹部，在這篇作品中留下了個人特有的社會閱歷和思考的印跡，即在理想主義的陶醉中敏銳而朦朧地感受到一種潛藏在社會心臟部分的不和諧之音。

從當時特定的閱讀期待視野出發，人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會主義條件下官僚主義作風的小說。小說講述

17 作者原稿題目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後由《人民文學》編輯部（秦兆陽）作了修改。參見《〈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因作者對修改有不同意見，故在《1956年短篇小說選》（中國作家協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文學作品選讀·建國以來短篇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等版本中，又恢復了原稿的題目。但考慮到當時發生重要影響的還是發表於《人民文學》的版本，故本文的論述仍以此為據。

了一個對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作品圍繞組織部對通華麻袋廠黨支部事件的處理經過，相當成功地刻畫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而在這些人物當中，劉世吾的形象的刻畫尤其受到重視和肯定。劉世吾的形象當時被認為是一個頗有深度的官僚主義的典型。他有一定的革命經歷，也有相當的工作能力和魄力，懂得“領導藝術”，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點，只要一“下決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對工作缺乏積極主動的熱情，對那些有損於黨和人民利益的錯誤和缺點，有一種職業性的平靜甚至漠然。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員厭食症一般的職業病，他對什麼都“習慣了，疲倦了”，一句“就那麼回事”成了他的口頭禪；此外新生官僚主義者韓常新和蛻化變質的王清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說中直接抨擊的對象。在這一種閱讀和分析的視野裏，相對於對劉世吾形象的重視和爭議而言，對作為小說敘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雖然也有大致準確的把握，但這一形象在小說敘述結構中的作用和與作品主題的關聯則明顯地存在被忽視的傾向。

從小說的文本實際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具有揭示官僚主義現象、“積極干預現實”的外部寫真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個人體驗和感受為原發點，通過個人的理想激情與現實環境的衝突，表現敘述人心路歷程的成長小說。主人公從一個小學教師的崗位，帶著一種“節日的興奮”來到組織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結果卻發現這裏的情形與自己的想像有著很大的差距，一些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革命意志和工作熱情的衰退使他憤怒、疑惑，他為自己無法融合於這一環境而惶恐、傷感。與對外部衝突的再現相比，作者更注重對敘述人心理內部衝突的表